

打开思想的疆界

——我与法国文学翻译

许钧 / 文

一、苦恋

我爱翻译，是基于对法国文学的爱。我去过法国，学过法国文学，我被“她”彻底征服了。她那么富于魅力，那么光彩照人，正如法国一句俗语所说，她是一位“令人无法抵挡的”美女。我深深地爱上了她，并热切地想把我心中的“恋人”介绍给中国读者，让大家一睹她的风采。

也许我的这种爱是自私的。记得有一位法国作家说过：“翻译是将与自己的恋人酷似的女子奉献给他人。”不管怎么说，是自己心目中的恋人也罢，是与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也罢，也终归是一种奉献。我的心是诚的，当我将倾注着我赤诚的爱的译作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的时候，我感到幸福，也感到负疚，感到害怕，我总是带着一种负罪感，担心由于自己的无能、失误与笨拙，表现不出我恋人的气质与风采，得不到中国读者的青睐；更担心由于情趣的低下，鉴别力的缺乏，不慎把一位丑陋、淫荡的女子介绍给他人，有伤风化。但我没有忘记，当钱林森教授与我合作翻译的法国文坛新秀亨利·古龙日的杰作《永别了，疯妈妈》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普遍赞誉，《人民日报》、《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新华日报》相继发表评介文章，不少读者给我们来信倾吐他们对这部作品的爱时，我的负疚感、恐惧感曾一时烟消云散，我陶醉在这种难以言表的幸福之中。这种幸福，往往交织着自豪，当你心爱的人得到交口称赞，受到喜爱的时候，你心中难道不会升腾起一种自豪感吗？

我尝过“初恋”失败的痛苦。说来不怕见笑，我这人没有什么才气，更没有灵气，只是由于迷上法国文学，任凭着自己满腔的热情去执著地追求。不过，我还算有几分自知之明，并不敢高攀，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第一位对象：法国当代作家西默农的《黄狗》。没想到有人捷足先登，当我在希望与追求中度过了几个月，准备让自己的情人亮相的时候，我在北京火车站的售书亭偶然发现她早已被他人相中，被介绍给中国读者了。空空单相思一场，近百个日日夜夜的心血化

为乌有，我感到有一种难述的苦涩。苦归苦，我还是解脱了，因为我从失败中倒产生了几分自信：我的眼力还不错。

我在法兰西当代文苑中不懈地寻觅，我爱上了勒·克莱齐奥的《沙漠的女儿》，又恋上了博达尔的《安娜·玛丽》，梦中又在特丽奥莱的《月神园》中遨游。爱是幸福的，也是痛苦的。就说《沙漠的女儿》吧，她外貌并无惊人之美，更无娇媚之处，却不乏新小说的某种古怪。时空的跳跃，词语的怪奇，初次见面时，我非但没有一见钟情，感情上没有激起一丝涟漪，反而感到陌生，不理解，当时险些与她分手。可初次相见时，她的古怪中似乎蕴含着某种新颖，我好奇地打量着她，凝望着她，渐渐地，那跳跃的时空中呈现出一个荒凉与繁华，贫乏与豪富兼而有之、对比鲜明、寓意深刻的世界，那怪奇的词语创造出一幅色彩缤纷、变幻无穷的图像，处处透溢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她理应受到，也确实得到了广大中国读者的喜爱。我庆幸没有抛弃她，要不，我会后悔一辈子的，而这种悔恨岂不是也会造成痛苦？

我忘不了导师陈宗宝先生翻译的一句话：“只有倾注了自己的爱，才可能有力量去打动他人的心。”不谦虚地说，我是努力的。既然我爱上了，我总是设法要无愧于自己的恋人。我时时在告诫自己，切勿玩弄感情，把连自己都不爱的作品推销给他人；我也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自己的草率、疏忽或主观，破坏了自己恋人的形象，把一部大师的优秀作品糟蹋成连一个普通读者都不屑一顾的下脚料。我更在心中默默地发誓：一定要汲取养分，完善自己，为自己的恋人争光。正是怀着这种良好的愿望，我在1987年应约参加了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普鲁斯特的长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

二、创造

回想初学翻译那些阵子，兴趣浓，劲头足，胆子大，想得天真，少有顾忌，匆匆挑选一部自己较为喜爱的书，便抱着词典，“从容”操刀，速度之快捷，心底之坦然，是涉足译坛近二十年后的我所远远不及的。

洋洋四十万言的处女译作《永别了，疯妈妈》问世后，意外地得到了一片赞誉，着实有过一阵子兴奋与陶醉，冷静之后，仔细端详着这位经我手而脱胎换骨的新生儿，怀着一股子好奇心，又对着“她”在故国的模样细细比较，愈看心中愈是不安：说像又不像，说不像又像，相似处犹感平乏，不似处倒显魅力，个中的原因未去深究，只是感到满腹委屈，白费了自己对那位异邦之女的一片忠贞，心中不是滋味。

后来，慢慢译多了，读研究生时又专攻“翻译理论”，虽然翻译的兴趣不减，但脑子复杂多了，当初操笔时的那种“从容不迫”的感觉也消失了，并渐渐地悟出了一些道理，翻译，岂能只凭一片忠诚，况且涉及翻译的因素之多往往使你束手无策，不知忠诚于谁为好。忠其形，求貌之相似，可其神韵呢，气势呢？文学精品往往刻意寻求意在言外的效果，翻译时稍不小心，就容易得其形而忘其神，成为真正忤逆不道的“叛



逆”。可是，既要忠其形，又要得其神，谈何容易啊！法国文学巨匠普鲁斯特那部称之为“不可移植”的巨著的译名，曾煞费了编辑、译家与专家们多少苦心，但《追忆似水年华》这个得之不易的译名仍无法使每个人都满意。我有幸参加了译林出版社组织领导的这部巨著的翻译，花费了近三百个日日夜夜，才勉强地完成了所承译的二十余万字的初稿，其间所经受的痛苦、恐惧，往往使我心力交瘁，尤其那一种唯恐背叛原著的负罪感，使我负载着一个沉重异常的十字架，作品中那长达数十行的“意识流”连环句式，那声、色、味一应跃然纸上的形象笔触，那妙不可言的隐喻双关，还有那或细腻、或粗犷、或高雅的生花妙笔，岂得凭兴趣、凭忠诚、率而操笔所能传达？亦步亦趋地求文字对应，为两种语言特有的规律与魅力所不容，往往导致貌合神离；洒脱大胆地弃其形，求其神，又担心“创造”出一个貌离神散的畸形儿。更不谈还要不辱使命，追求作品“形式因素美学价值”的再现，“文化因素”的移植，“文学形象”的再创造和“语用意义”的传达……这般复杂，这般艰辛，这般痛苦，是当初涉足译坛时所料不及的。如今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忠诚”与“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双重性格，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这也许就是“相似处犹显平乏，不似处倒见魅力”的翻译辩证法吧。这一双重性格如何把握，结局悲惨还是圆满，取决于译者的创造力，而要创造，就不能不要求译者的自我修炼与完善。

〔250/251〕

三、开拓思想的疆界

1995年8月，赴北京参加“亚洲翻译家论坛”，抽暇拜访了好友郭宏安先生，与他一起畅谈翻译。他问我，跟翻译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感觉如何。我说很苦，也很幸福。如果有来生，还是选择翻译。

确实，我对翻译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此情之诚，似乎感动了上帝。在我人生的重大转折时期，我如愿以偿，进了南京大学，得以继续和翻译打交道。这些年来，我不仅做翻译，而且还教翻译，研究翻译，三位一体，于我真可谓“至福”。

翻译于我，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一种兴趣，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由于有了翻译，我从来没有过被命运之神忽略的悲哀，更没有过常人在商品社会里无所适从的茫然。我爱翻译，并以我执著、赤诚的爱，去影响我的学生，我的朋友，让更多的人献身于这一旨在人类交流和沟通的神圣事业。教翻译，首先教做人，翻译求真，以诚为本。钱钟书先生说，翻译最高的境界是“化境”。我想“化”与“讹”，只有一个偏旁之差，求“化境”，不能太功利，太随心所欲，不然，“化”不成，反倒有“讹”之嫌。做翻译和做人一样，能保持本色最好，原汁原味，不矫不饰，以真诚求真美。

为求真美，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翻译的探索。翻译是人类交流史上最古老、最复杂的文化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翻译是再创造，可再创造的基础何在？再创造的度如何确定？评判翻译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这一个个在圈外人看来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恰为翻译理论提供了生存的基础。应该说，我对翻译的认识是在不断加深的。1997年，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若斯潘来华访问，在访沪期间，邀请中方各届人士数十名在法国人设计的上海大剧院会面。记得在会上，我曾针对若斯潘总理在演讲中所强调的“文化价值”问题，向他发问：“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面对世界的‘英语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法国政府何以维护法语的地位，又何以发扬光大法兰西文化？”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思考：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任何一个维护民族文化价值的国家都不会听任自己的语言被英语所取代。而对世界来说，经济可以全球化，甚至货币也可以一体化，但文化则要鼓励多元化。他认为，正是本着文化多元化的精神，法兰西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得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与丰富。若斯潘的这番回答，尤其他对文化多元化原则的阐发，引发了我日后对文化问题，尤其是对翻译问题的不少思考。若从政治的角度看，法国鼓励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推崇文化多元价值观，也许是对抗美国经济霸权的一种策略。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兰西对文化价值的推崇，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对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努力，是以其深厚的民族传统为基础的。不然，很难想象法兰西民族会有其绵延千年、昌盛不衰、为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化，更难以想象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思潮与流派大都会发轫于法国。基于对翻译有着自己明确的理解和认识，我主编了冠以“法兰西书库”之名的开放性译丛，表明了我对文化多元价值观的一种认同，也是多元文化精神的一种直接体现，目的在于让广大中国读者能听到法兰西思想的不同声音，看到法兰西文化的不同侧面，欣赏到法兰西文学艺术的不同风采。

如今，在我看来，从源头上讲，翻译所起的最为本质的作用之一，便是基于交际的人类心灵的沟通。翻译因人类的交际需要而生，在克服阻碍交流的语言差异的同时，翻译为交流打开了通道。多亏翻译，人类社会从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开阔。阿弗雷德·波拉德在论述《圣经》翻译的重要意义时说过一段不乏诗意而又极为深刻的话：“翻译如同打开窗户，让阳光照射进来；翻译如同砸碎硬壳，让我们享用果仁；翻译如同拉开帷幕，让我们能窥见最神圣的殿堂；翻译如同揭开井盖，让我们能汲取甘泉。”波拉德的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圣经》翻译而论的，但从中我们不难领会到，翻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既有精神之光芒，又有物质之果实。借助翻译，人类社会不断交流其创造的文明成果，互通有无，彼此促进。应该说，没有旨在沟通人类心灵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即我们所说的翻译活动，人类社会便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感谢法国，感谢法国文学翻译，让我拓展了思想的疆界，领悟到了翻译的真谛。